

世界政治理论的最后一部分是作用机制，即不同的思潮如何转化为具体的世界政治实践和世界政治秩序。核心的作用机制是政治斗争，包括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可以具体分为主导群体的倡导、弱势群体的学习、双方的妥协等基本政治斗争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会塑造不同国际秩序和国内基本制度变迁。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全球治理的转型

王明进*

新自由主义是当前主导性的世界思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制定政策，从而推动着世界政治的发展；同时，全球治理这个概念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或推动下，全球化的发展进入高潮阶段提出来的。1992 年由 28 个名人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推出了全球治理这个概念。当时的目的就是解决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产生的全球性问题，但全球治理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也说明其新自由主义内涵比较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探讨了世界政治中的治理问题，强调减少政府的干预，具有很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冷战结束之后的一轮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全球化，而全球治理这个概念的提出恰恰是为了给全球化产生的问题提供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但现在看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出现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看来并不太可行。

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国家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为资本争取自由，在广阔的战线上力图废除各种控制措施，反对国家的干预，提倡小政府大社会，鼓吹私有化，神化市场的作用。同时，还通过贸易制裁或者其他高压手段向其他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政策，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提供的援助方案都是

* 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新自由主义的确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迎来了经济繁荣，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问题是这种繁荣并不是普惠的，而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并最终走向危机。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有利于跨国资本的财富积累，但这种财富的积累并不普遍惠及普通民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繁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的不平等。关于西方国家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有很多人们所熟知的数据，例如，在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精英阶层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超过70%的财富集中在10%的人的手中。总体来讲，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财富的积累，同时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也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扫清了道路，使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向劳动力、生产成本低的地方迁徙，形成了产业空心化，造成了传统产业工人失业和国内贫富差距扩大。这种产业转移导致国家税收减少，再加上政府为了增加本国企业竞争力和吸引投资，实行减税政策，但这种减税政策仅仅有利于资本。其后果是国家税收的减少，国家治理能力被削弱，导致西方战后形成的社会福利体系难以维持，进一步损害了普通民众利益，其后果是贫富差距大扩大，导致社会分裂加深，在西方兴起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浪潮。

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逐渐失去动力，日益走向其反面。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客利用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煽动民粹主义情绪，大搞保护主义，掀起剧烈的贸易摩擦，退出各种多边国际机制；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强调打破国家边界，强调消除或者削弱国家主权，在国际上导致对脆弱国家的剥夺，冷战之后的几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就是对脆弱国家的剥夺，加剧了全球性不平等，导致民粹主义思潮的全球泛滥。“不平等成为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和政治动荡的根源，个人宣泄不满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又促使反全球主义思潮的出现，反全球主义必然导致对外强硬的政府。”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走向了反面，造成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衡，导致了全球治理的低效或者无效。新自由主义给我们提供的全球治理模式，与人们的期待相差较大，现在就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当前国际秩序、多边贸易机制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增强，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使贸易摩擦加剧，威胁产业链和供应链，国际贸易循环受到干扰，人类在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发展不平衡

问题、绿色转型问题等方面的合作面临困难。所以现在也讲全球化出现了“赤字”。民粹主义浪潮的全球性崛起，导致多边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治理面临巨大的阻力和危机。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是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奉行维护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实行压缩公共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的紧缩政策，这种理念弱化了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而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并不会对控制疫情和公众的生命安全负责。从西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情况来看，削减社会公共开支导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医疗服务体系经费不足，最后让整个社会承担应对疫情不力的严重后果。同时，疫情的暴发加剧了西方主要国家对医疗资源的争夺，以邻为壑、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出现，在需要全球合作的时候撤销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的支持，通过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推脱抗疫不力的责任，破坏全球的抗疫合作。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行了多年之后，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西方一些国家大搞单边主义和小集团主义，不断弱化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多边主义受到了威胁，全球治理陷入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有新的治理经验的汇入。全球治理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而产生，同时也是国家治理模式在国际上扩散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全球治理，必然打上了西方国家主流治理模式的烙印。在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出现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又不愿意接受其他治理经验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由全球化所开启，它以相互依赖为基础，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以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为主要路径选择。”在全球治理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变？全球治理要解决问题，达到功能性的目标，应对全球性问题，比如资源、环境、人口、生化武器、核武器、跨国移民、大规模传染病等，因此要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变，就需要形成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整体性存在、世界主义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利益等这些基本共识，需要增进各国相互合作的意识，扭转新自由主义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治理失衡和赤字的状况。这就要求各国秉持共商、共建的全球治理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即开放、平等、非意识形态化的多边主义，让多元主题通过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方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不同国家治理模式交流互鉴可以成为全球治理创新的源泉。”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显示了不同治理模式的优劣和价值，不同治理模式的交流互鉴，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创新动能，使全球治理焕发新的活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模式遭遇危机之后，更需要来自新型经济体治理的经验，汲取更加多元的治理智慧，使全球治理朝向更加具有包容性、普惠性和高效性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时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治理能力。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指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2021年3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外长专门就全球治理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其核心是要郑重阐明中俄两国在人权、民主、国际法、多边主义等问题上的根本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和平和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是与全球化问题同步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蓬勃发展，全球化使得劳动力、资金、产业链自由流动，在带来了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问题。首先，各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在面对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病和持续发展等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应该秉持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多边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能够使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多边的方式进行合作、协商，充分理解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将人类视作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其次，应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时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治理能力。最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可以大有作为，应该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使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态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权力，

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中国方案。

半边缘国家的半无产阶级：一个研究视角

任洪生*

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许多国家都积极融入（incorporation）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然而，融入半边缘区之后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国家长期停滞不前，徘徊在核心区和半边缘区之间，例如葡萄牙；有的国家则发展迅猛，迅速融入核心区，例如爱尔兰；有的却丧失了最初的动力，跌落（reverse）回边缘区，例如阿根廷。融入核心区是每个国家的终极目标，然而，我们发现，融入和边缘化之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半边缘区的国家却常常面对相当强的相反力量而陷入一种困境。成功跻身于半边缘区的国家，融入核心区的寥寥无几，经常出现的现象是重新跌回边缘区。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半边缘区是一个竞技场，在不同的时空中，半边缘地区的发展可以打破世界体系长达数百年的政治僵局。因此，认识半边缘区国家的发展动力，是世界体系论者应该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半边缘区融入的成功在于国家的干预，认为国家为了保护和提高该国国内公司和人民的经济地位应采取较高程度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这种半边缘地区国家的发展模式，被称为“国家主导型”“发展型”或“威权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将国家概念作为一个解释政治经济现象的重要变量，其作为一个一元整体能够对融入成功的国家做出解释。主要的案例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兴起。他们认为，国家不仅是一个行为体，而且是具有连续性的一系列制度，一个为集团的组织提供不同激励的场地。在向核心区融入过程中，半边缘国家供给一系列特定的制度条件，这些条件使半边缘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进步取得成功。例如，韩国的发展主要是国家与资

* 任洪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